

庄蕴宽与创建时期的故宫博物院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庄蕴宽就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一八”惨案后,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遭通缉,新推委员长卢永祥没有到职,庄蕴宽以副委员长出面担当重任,两拒故宫驻军,坚持点交文物,体现了一个故宫守护者始终不离不弃舍身庇护的担当精神,在故宫博物院最初的创建以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 庄蕴宽;故宫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院务维持员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1-0016-09

庄蕴宽研究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顾敏琪的硕士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庄蕴宽》与张超《周树模、庄蕴宽与民国初年的两次复辟运动》是仅有的学术论文;传记《国土无双——庄蕴宽传》由于并非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无关学术,这里就不予置评。关于庄蕴宽与创建时期的故宫博物院,吴瀛早在1930年写作《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时就多有涉及,相关叙述为后来的《故宫沧桑》《故宫志》等所承袭。其实,史实有待发覆,庄蕴宽与创建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关系,还有待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面貌。

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号抱闷,晚年称无碍居士,江苏常州人。早年就学于江阴南菁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考中副贡后步入仕途,于1896年赴广西任职,十余年间历任百色厅同知、平南知县、梧州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龙州边防督办等职。1907年黄兴亲自主持镇南关之役,冒险出入越桂间,不慎为法警截留,庄蕴宽请法国教堂司铎出面保释,使其幸免于难。^[1] 1909年底辞官归里。1910年初出任吴淞商船学校监督而卜居上海,与同乡立宪派人物赵凤昌时常往来,并于同年加入张謇等人筹办的预备立宪公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庄蕴宽不避艰险,持张謇、章太炎信赴鄂与黄兴见面,成为立宪、革命两派沟通的纽带。

1912年1月10日,庄蕴宽任民国临时政府时期的江苏代理都督,主持苏政三月有余,致力于新政权的稳定工作,坚持贯彻了“不扰民、不借债、不增兵”的治理理念。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翌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庄蕴宽两次致电孙中山^①,并通电各省都督、督抚、省议会、咨议局,呼吁地方实力派支持定都北京,攻击孙中山依法咨请参议院复议建都问题是“立法为行政所侵”。

1913年3月的刺杀宋教仁案,使庄蕴宽摆脱了此前对袁世凯的迷信。1914年3月4日,庄蕴宽任北洋政府肃政厅都肃政史。1914年3月,约法会议开会,议员57人,实到44人。袁世凯向会议提出“修改约法大纲七条”,旨在炮制新约法以取代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总统权限。最后表决结果43比1,庄蕴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继而筹安会起,向袁世凯劝进,一时舆论哗然。庄蕴宽所领导的肃政厅公署收到来自各处弹劾杨度及筹安会的呈文,都肃政史庄蕴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筹安会问题,议决呈请袁世凯取消筹安会。1915年12月11日,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议院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开票,1993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并向袁世凯上总推戴书。次日,袁世凯颁令接

[收稿日期] 2016-11-20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国故宫博物院史”(13LSB009)

[作者简介] 章宏伟(1964—),男,浙江温岭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故宫学。

受帝位。庄蕴宽犯颜直谏,呈文袁世凯,痛陈“帝制之不可为,民意之不可假,时代潮流之不可拂”,并提出取消洪宪年号、撤销大典筹备处及参议院。

一、清室善后委员会监察员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总统曹锟,组建摄政内阁,以黄郛摄行总统职务。11月5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迁出宫禁。11月14日,《政府公报》发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②。11月20日,善后会成立,连同李煜瀛委员长一共是15人。条例之内,还有一项监察员,内中规定,有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北京教育会是法定监察员外,应该特聘3人,于是聘了吴稚晖、张继和庄蕴宽。^{[2]43}前二人为国民党元老。庄蕴宽做为审计院院长,被推为委员会监察员,是委员会名誉的重要保证,也是向各界昭示大公的见证。

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章草案》。从登记、编号到物品挪动,建立了严格的监督机制和责任制。^③原定于12月22日召开的点查预备会,因为还未到任的段祺瑞执政府发来公函制止而被迫停止。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接到这一公函后,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群情激奋,庄蕴宽、易培基、吴稚晖等发言最多,坚持不向段执政府屈服。会议一致决议照旧点查,并推吴稚晖及国务院所派助理员杨千里起草答复内务部。庄蕴宽夜间与内务部王耕木次长晤谈,并给内务总长龚仙洲(心湛)写信,从中斡旋调停。12月23日,依照决议出组查点乾清宫,因军警都没有到,也就为章程所限,这组未出成。

24日一早,大家都来到神武门,警察仍旧未到,但是鹿部的军队驻在宫内的却派了人来,所谓规则内所称军警,即以军来代表了。出组的地点是乾清宫,组长是陈去病。庄蕴宽参加了第一天的清宫物品点查,身份是监视。

24日当天,临时执政段祺瑞召集国务会议,就清室善后委员会及清宫物品点查,议决办法五条。

段祺瑞亲笔批了“可,如拟办”四字。这个批示是“故宫”日后能够名正言顺在历史上存在的,最关键的一个文件。又订了一个《各部院长官轮流察看查点清宫物件日期表》。善后会可以合理合法地进入故宫开始点查工作了。庄蕴宽积极参加清室文物的点查工作,共参加了7次点查。

清宫物品点查过程中,李煜瀛等人考虑到故宫“关于历史文化者甚巨”,只有把这项“革命事业”渐进为“社会事业”,方不致“受政潮之波动”的影响^④。李煜瀛早年“在赴法留学时,在巴黎见到法皇的狼宫,在法国大革命后改成罗浮博物院,也就是狼宫博物院。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想回国革命成功后,将清宫改为博物院”^⑤。可以说,李煜瀛建立博物院的想法由来已久。11月7日的“大总统令”已指出“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而善后会就是政府成立的,虽然不占编制,但是经内阁商定聘任、且政府负责相关费用,自然属于政府行为,善后会照章行事,得到现政府的积极支持与配合,段祺瑞不仅批准了善后会点查清宫物品,成立故宫博物院实际上也是段祺瑞批准和支持的,吴瀛记载“执政府会同清室善后委员会拟订了开幕典礼主席团名单”^{[3]89},并确定开院典礼的相关议程。

二、主持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制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与《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决定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许溥仪复宫,保护国宝安全;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并对董事会、理事会的职权与义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⑥。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因博物院的院址在故宫,保藏的又是故宫的文物,议定院名为“故宫博物院”。

根据《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的领导机构为临时董事会与理事会。清室善后委

①《庄蕴宽为亟速解决统一政府事致孙中山电 第三百二十六号 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庄蕴宽为主张袁世凯在北京受职建都问题可付诸国会公决事致孙中山等电 第三百四十三号 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马振犊、郭必强主编:《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4》,凤凰出版社,2011年6月,第1179、1191页。

②《政府公报》1924年,第3104号,第4—5页。

③《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议决)》,《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1卷第1期,1925年,第3—4页。

④《清室善后委员会宣言》,《申报》1925年8月17日。

⑤ 蒋复璁:《李石曾先生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大成》,第85期。

⑥《清室善后委员会议事录(1925年9月29日)》,故宫博物院档案,jfqgdat00003。《清室善后委员会重要会议》,《申报》1925年10月2日。

员会推定故宫博物院董、理事名单。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煜瀛等 21 人为董事，都是政界、军界、学术界的名流，在社会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力，有的人（如严修）虽被推为董事，但本人并没有接受^[4]，这可能是临时董事会没有召开，没有推举董事长的一个原因。庄蕴宽被推为董事。董事会的职权为：推举临时理事长及理事；审核全院预算决算，保管院产；监察全院进行事项；议决理事会及各馆提出的重要事项；筹备正式董事会及拟定董事会条例。

在理事会下设古物、图书两馆。现在《故宫博物院历程》、故宫博物院官网上的“院史编年”和《故宫博物院八十年》说（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庄蕴宽兼图书馆馆长，显然是不对的。据《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理事会作为决策中心执行全院事务，分馆务、总务两种。馆务由古物馆、图书馆处理，总务设总务处处理。“第二条 本理事会所属古物馆、图书馆，各设馆长一人、副馆长二人，馆长、副馆长为当然理事。”“第三条 除上条当然理事外，其余理事，由筹备主任就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中聘请之。”临时理事会以理事 9 人组成，即：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公推李煜瀛为理事长，主持院务。李煜瀛、黄郛、鹿钟麟三人显然是据第三条聘请的，只是黄郛并不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估计大家认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在黄郛担任摄政内阁总理任上成立的，聘请他为故宫博物院理事，虽然与《章程》不符，但大家都不会提异议，因而才有了与《章程》的矛盾，大家也都视而不见。后六位显然就是古物、图书二馆的馆长、副馆长。庄蕴宽不是临时理事会理

事，因而不可能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现能查到 1926 年 8 月 21 日《申报》的报道文字：“至故宫博物院之由来，则清室善后委员会所递嬗。该院分两部，一古物馆，馆长易培基，副以高（马）衡；一图书馆，馆长陈垣，副以沈兼士。”^①而且，建院以来就是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在 1930 年写的《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概况》中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首任馆长为陈垣^②。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但故宫官网上这条内容又是从何处来的呢？有待在院史档案中继续查考。

1925 年 10 月 10 午后，李石曾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③，门外搭起了花牌楼。顺贞门内竖起了大幅《全宫略图》。社会各界纷纷拥来乾清门内，场面热闹非凡。除观看开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数千年来壁垒森严之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宝。欢快的乐曲声中，应邀出席开院的军警法工商学新闻界的 3500 多位贵宾，也都陆续到达。

1925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开幕典礼，庄严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朝野各界要人出席了典礼。开院典礼由清室善后委员会监察员、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庄蕴宽担任主席，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董事、理事长李煜瀛首先报告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与故宫博物院筹备情形。次由前摄政内阁总理、故宫博物院董事兼理事黄郛讲话，内中的一段话属对敌视故宫博物院者的严正警告：“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执政府外交总长、董事王正廷，京畿警备司令、董事兼理事鹿钟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董事于右任，以及全国水利局总裁袁良等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

① 《北京通信（所谓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问题）》，《申报》1926 年 8 月 21 日。

② 袁同礼：《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概况》，《图书馆学季刊》4 卷 2 期，1930 年 6 月。

③ 单士元《我与初建的故宫博物院及院匾轶事》说：“忆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被选推为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的理事长李煜瀛先生在当年故宫文书科内，粘连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李先生善榜书，功力极深，当时我有幸捧砚在侧，真是敬佩不已。在成立故宫博物院隆重的庆典大会上，已庄重地镶嵌在原皇宫北门神武门的红墙上。”（单士元：《故宫史话》，新世界出版社，2004 年，第 120 页。）宋兆麟《故宫院史留真》也说：“民国十四年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于乾清门举行开幕大会……神武门外搭起花牌楼，门洞上方悬以李煜瀛理事长手书之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宋兆麟主编：《故宫院史留真》，台北故宫博物院，2013 年，第 21 页）但从图片来看，两位先生的叙述均有误，在 1925 年 10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在故宫博物院唯一的出入口——紫禁城北门神武门中门的上方，是悬挂的白底黑色大字木匾，手书匾留边极窄，并不是镶嵌的青石匾额，图片见《故宫院史留真》第 21 页图 40“故宫博物院开幕时之神武门楼”。1930 年 8 月 30 日，神武门原先所悬挂的李煜瀛题木质“故宫博物院”匾被撤下，代之石质的“故宫博物院”匾，依然为李煜瀛颜体手书，石匾四周加有一圈石质边框，新匾被直接嵌在了神武门中门洞的正上方。图片见《故宫院史留真》第 21 页图 39“悬挂李煜瀛手书‘故宫博物院’门匾之神武门楼”。《故宫院史留真》第 45 页图 153（引自《故宫博物院八十年》）“故宫博物院十周年院庆时之神武门”，题注误。1935 年故宫博物院十周年院庆时，院匾已是石质，本图片匾额与图 40 相同，且悬挂有青天白日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应当是 1928 年北伐胜利以后所拍摄，疑此照为 1930 年 5 月 20 日御花园游园会时拍摄。

义,吁请各界支持。^①故宫博物院的创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它将紫禁城这座昔日皇帝居住的禁区,变为人民百姓自由参观的场所。

三、故宫博物院院务维持员

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2000余人,徐谦主席,顾孟余演说,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门前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请愿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学生在执政府门口被卫队枪杀47人,伤132人,引起了学界大愤、社会不平。段政府商议处理办法,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伤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政府认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名,为国务院前大惨剧之首谋者,已于十九日下逮捕令,其内容略谓:‘徐谦等五名,藉名共产学说,屡酿事端。此次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之名义,散布宣传传单,率暴徒数百名袭国务院,灌火油,投炸弹,用棍棒殴打军警。军警出于正当防卫,其结果致双方皆有死伤。如此行为,几无国法,深堪痛恨。今已暴露该暴徒等曾潜赴谷地,屡谋不轨,国家之秩序,将濒于危机。除京师令军警尽力防范外,着各地方长官一律严重取缔,以灭祸根。徐谦等五名不问在北京内外,概行逮捕,依法处罚。’……命通缉徐谦等。”^②故宫博物院的李、易两位都被迫逃跑,避难俄使馆。李后来避居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2]51},易也避居东交民巷^③。故宫博物院的院务陷入无人负责的状态。

3月29日,故宫博物院董事会与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董事卢永祥、庄蕴宽、陈垣三人维持现状。^④卢永祥是皖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苏皖宣抚使,段祺瑞曾电促卢永祥来京面商入阁,但卢坚请不就陆军总长职。他是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这次推举他出面维持故宫院务,是考虑他与段

祺瑞有私谊,有利于维持故宫博物院的事业;庄蕴宽曾任北京政府都肃政史、审计院长,以反对袁世凯复辟扬名,所以庄蕴宽被公推为特殊时期的维持员有着特殊的意义;陈垣从清室善后委员会时起,就是故宫的核心人物,李煜瀛在1924年12月3日就函请陈代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5],同月又委托陈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敬请先生担任本会会长所应兼任之常务委员一席,以便办理一切。煜瀛其他事务亦甚繁颐,如值出京之时,所有本会会长职务,亦请先生随时代理,以免有误要公。”^[6]陈垣长于事务处理,又得李煜瀛信任,所以有“事务长”之称,也可见他在故宫博物院创建时期出力颇多,地位重要。但故宫博物院毕竟是政府的事业,在非常时期推选的负责人还要考虑到段祺瑞政府的认可,在当时情况下,卢、庄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而陈垣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在4月5日的交接会议上就初露端倪,后来也因此而慢慢退出了故宫事务。

4月5日,“北京今日故宫博物院西北军撤退,交保安队接管。委员会推卢永祥委员长、庄蕴宽副。”^⑤卢永祥其时在天津^⑥,这在民国前期,好多政治人物都寓居天津,并不影响到北京来做事。但卢以“病体未痊,势难担任”推辞了维持员之职(何时推辞现还未考得),卢永祥也从未到故宫露过脸,实际上故宫博物院院务由庄蕴宽一人主持。1926年8月21日《申报》的文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及今年三一八案起,李煜瀛、易培基通缉,该会、该院领袖去三之二,乃公推庄蕴宽为保管员,经段政府认可,而撤去原任守护之国民军,改用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警卫。”^⑦庄蕴宽出面维持故宫博物院院务从4月初到7月底,在这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不少困难接踵而至。

也是在4月5日,故宫博物院举行了新维持员与旧董事会、理事会办理交接手续的会议,“由委员会召集各委员、监察员、各部院助理员及顾问开会,

①《故宫博物院开幕纪盛》,《兴华》第22卷第41期,1925年。

②《北京军警枪杀请愿团之大惨剧》,《申报》1926年3月20日。

③《申报》1926年4月3日《易培基昨晨返沪》:“中国新闻社云:前教育总长易培基偕蔡元培氏赴杭游历。兹悉易氏已于昨晨返沪。”则易在3月底就应离京南下。但《申报》1926年11月22日报道:“前任教育总长易培基氏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被段政府通缉,避居东交民巷数月。现应国民政府之召,于上月杪先由寓所移居德国医院,后移居某使馆,本月一日乘汽车潜行至津,由津搭轮赴沪。日前乘大通轮到汉,寓交通旅馆一百三十号。昨有人访易于寓所,易称……”11月16日有类似报道。应以后者为是。

④《申报》1926年4月2日。

⑤《申报》1926年4月8日。

⑥《京城之炸弹恐慌》,《申报》1926年4月6日。

⑦《北京通信(所谓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问题)》,《申报》1926年8月21日。

是日钟麟派主任参谋陈继淹代表到会,正式交代。会议时,除前述各委员等外,来宾并有各部署长官及各界名流、新闻记者,计共三百人左右。”参加者主要有四方面的人:一、新推维持员庄蕴宽;二、旧委员会代表陈垣;三、旧守卫方面出席的是鹿钟麟的代表参谋陈继淹;四、新守卫方面接任守卫责任的,是内务部警卫队并且掺入一部分古物陈列所警卫队合组的守卫队,同时还有全体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暨法庭方面的监察人员、各部总长。这一天,鹿钟麟所辖驻守故宫的部队交卸撤退守卫之责,撤出北京。鹿钟麟总司令虽然没有亲自莅会,但给北京各部院、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及全国同胞发出了一个通电,详述“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起,钟麟以警卫京畿之职务,选派队伍,会同保安队及驻守警察,三方共同负守卫宫门稽查出入之责(其时钟麟未兼任警察总监)。与宫内古物,无直接关联,至十五年四月五日交代之日止,分任守卫者,计一年又六个月”,这期间他因“忝居京畿警卫之职,协同守护”,以及“脱卸守卫之责”之时,“窃喜乘此得以证明一切古物之丝毫无缺,尤为明告内外清白交代之适当时机。”^[7]文字冗长,由此可见鹿钟麟是一位周到详密的军人,以及他如何地洁身自好,注重这一行动。

陈垣在代表旧委员会交代演说词中不承认是借用内务部的卫队,说:“今天我们自练守卫队成立之期。”吴瀛在回忆文字中特别强调用内务部警卫队,有人顾虑着政府当局时时想着收故宫归政府。或许这是当时参与故宫领导的人们的一种不舍思想,其实故宫博物院本身就是国家的,由哪些人来管理并不代表什么,现有的史著都未脱离这些故宫博物院开创者的思维,对于后继者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是不应该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论著都在刻意强调庄蕴宽主持故宫时经费无着,段祺瑞明确向庄蕴宽表示:“要用款,只要开出数目,我命令下面照付。”庄蕴宽为了避免执政府插手故宫事务,故宫所需经费坚持不要段政府拨款,自己出面,由熊希龄等担保,从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维持院里的开支。其实,政府自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即拨款。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函审计院送本院支出计

算书及对照表”^①档案中,记载从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到1926年9月底,善后会与故宫博物院共收入银洋137148.997元,支出银洋136691.208元,收支基本平衡,并不存在经费无着问题。同时这份档案中还有一份“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自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起至十五年(1926年)九月底止直接收入计算书”,列举了参观券售价、照片摄影集售价、故宫图说售价、复辟文证售价、点查物品报告售价、古物拓片售价、房地租金、银行利息等项,共收入77970.547元,并且全部借充本院经费。这份计算书列举的8项收入,都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通过经营获得,这些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的差额应该就是政府拨款,计有59178.45元。如果我们将其总支出平均除以月份数,可知故宫每月经常支出费用约5000多元,与借3万元供半年用度基本相合(这已不计故宫本身会有的收入)。据《申报》1926年4月30日报道,“北京内部咨财部,将故宫守卫处警饷列入预算,按月与京畿军警饷同发法便(原文如此,不好理解)。四月分经费已由关税项下拨给。”^②直到5月底,故宫博物院费断,由庄蕴宽托王士珍向汇理借3万元供半年用。^③此时段祺瑞早已下台到天津做寓公去了,根本不可能与段发生丝毫瓜葛。庄蕴宽接手维持故宫以后,根本没有过不要政府对故宫拨款之事,4月的拨款就是证明。5月底发生经济困难,那是因为1926年的四五月份是北京的非正常时期,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是由王士珍领导的京师临时治安会在维持着秩序。非常时期自然要用非常举措,与段祺瑞无关,也与政府无关,根本不是庄蕴宽为了避免执政府插手故宫事务的原因。对庄蕴宽以个人名义从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来维持新生的故宫博物院,需要一个合乎事实的解读。其事的意义没有多少,只要是一个管理者,都要做这件事。没有必要刻意强调。

4月9日夜,北京发生政变。鹿钟麟派兵包围国务院,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避入东交民巷。10日,段祺瑞允辞职。4月1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北京城内一时没有政府,北京商会、银行公会等组织京师临时治安会,聘王士珍等17人主持一切。^④临时治安会分设治安股、市政

① “函审计院送本院支出计算书及对照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财务档案,编号:jfaggcw100001。

② 《申报》1926年4月30日。

③ 《申报》1926年5月31日。

④ 《国民军退后之北京治安问题》,《申报》1926年4月23日。

股、慈善股、会计股、交际股等五股，办事分任，进行维持京师治安各事项。慈善股所掌管者为收容难民等事务，庄蕴宽即为办理此股中的一人。^①

4月18日，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奉军及直鲁联军驻北京城外者10余万，奸淫杀掠，时有所闻，民房被占用者不可胜数。无家可归的难民纷纷逃避城内，数在10万以上。21日，治安会在神武门、天安门设两难民收容所。城内人心恐慌，商铺开市者甚少。22日，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靳云鹗诸军代表开会，商定维持北京秩序办法，有组织奉直鲁联军总执法处、总稽查处，总理京城内外军纪；各军给养各军自给，不许向治安会及机关索取；将纪律不整之新兵、降兵及改编的队伍和白俄兵调往廊坊等七项。奉、直、鲁各军进入北京后胡作非为，扰乱治安，市面紊乱，物价暴涨，民心惶恐，舆论哗然。是日，吴佩孚通令所部不准扰民，张作霖、张宗昌等亦令所属遵守军纪。

23日下午，直鲁联军的两名军官带卫兵分乘两辆汽车直闯神武门，声言明日一早前来接收，将派兵驻扎，指令故宫立即腾出一些房子，供第二天前来的部队使用。并且不由分说，立即自动检查了全部办公房屋，同了带来的人士，指定某处作为某项办事处所，分派一切，扬长而去。庄蕴宽知道以后，迳自到了治安会，告知了负责维持北京治安的王士珍、赵尔巽，要求制止，并且明白声言：“故宫责任重大，本人极愿有力者来继续负责维持。但必须有一番手续，交代清楚。倘若不作交代，强来驻扎军队，那末，神武门内所有的故宫所藏，都是历代重要文物，我们都负有责任，万不能拱手相让。”治安会大家自然都以为然，那时他们正在外交大楼为奉联各军将领洗尘，因公同席上面询张、李几位领袖的军长，他们都否认知道此事，有人说：“或者部下的私人行动，自应下令制止。”在场的京畿警备总司令王翰鸣答应在神武门外张贴布告，严禁在神武门及故宫内驻军。

第二天，直鲁联军的大批军队果然开到神武门，幸而已有接洽，京畿警备总司令部的参谋李继舜等赶来制止，严重地交涉一番，这批军队方才开走。李参谋在宫门口贴了严禁军队驻扎的布告。

在故宫对面的景山，也有军队开进，后来也都知难而退。^{[3]99-100} 4月25日，北京各将领公决故宫内永不驻军队。^②

由于庄蕴宽的斡旋，阻止了直鲁联军进驻故宫。这对于故宫古物的保管，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是十分重大的事件。“故宫既是这样的轰动一时，大家都知道是一座宝藏，尤其是当时的一班军人武夫，他们的目光，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文物、文献这类的名词。他们只知道你争我夺的都是宝贝金银，哪个先下手为强，占据了这一座宝库，便一生吃不尽。”^{[3]100} 如果允许军队进宫驻扎，后果不敢想象。在国家如此乱局之下，庄蕴宽也曾是带兵之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军队进宫的种种不稳定，能够抓住一切可用资源，动用关系，平息此事，功莫大焉。

四、阻止用简单方式办理移交

段祺瑞4月20日下野，出逃天津，由国务院国务总理胡惟德摄行临时执政职务。5月13日，得到吴佩孚支持的颜惠庆组成新内阁，维持到6月，就因为张作霖的不满而垮台。

6月22日，以吴佩孚为后台的杜锡珪组阁。杜锡珪的上台，逊清遗老以为有机可乘，一面以清室内务府名义上书国务院，一面由康有为函电吴佩孚，公然提出“应请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的要求，请求恢复民国十三年修改优待条件以前状态，将故宫交还溥仪。吴佩孚复电康有为，“如果推翻，物议必多，只好听其自然。”没有上当。报纸揭露了清室遗老的这些活动，也大量发表了各方面人士，包括章太炎和一些国会议员纷起谴责的消息。7月16日，杜锡珪内阁内务部议定：溥仪已永废帝位，优待由政府以赈济方式拨款；拒绝发还皇室财产，唯赠与不含历史性之一小部分公产；允许溥仪岁时以平民礼仪祭扫其祖先陵寝。至此，有关迎溥仪还宫，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的种种活动才有所收敛。^③

“清室善后委员会，自委员长李石曾因政变离京后，即无形停顿。政府方面前此有由内务部专管之议，嗣因窒碍之处尚多，未克实现。惟该会所管理之故宫博物院，关系重要，若任其长此停顿，将来

① 《国民军退后之北京治安问题》，《申报》1926年4月23日。

② 《各将领会议之问题》，《申报》1926年4月26日。

③ 《申报》1926年7月19—26日有连续报道，如：《北京通信：清室要求恢复民十三之旧观》（7月19日）、《吴佩孚对交还故宫之谈》（7月20日）、《内务部决拒绝溥仪要求 反对恢复十三年原状》（7月21日）、《北京通信：溥仪复宫运动之急进》（7月24日）、《章太炎反对还溥仪故宫与吴佩孚往来电》（7月24日）、《北京通信：已告段落之溥仪复宫运动》（7月26日）。

不免有陷于不可收拾之境”，杜锡珪在8月10日的国务会议上提出讨论。^①8月14日，杜锡珪内阁正式通过改组故宫博物院，决定结束故宫博物院维持员的工作，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暂行保管办法》六条，由国务院函聘委员21人，设干事若干人，由院部分别派充，以下再设办事员若干人。^②21日，“故宫保管委员会”选举赵尔巽为委员长，孙宝琦为副委员长^③。在溥仪还宫的声浪尚未完全平息之际，故宫保管委员会来接管故宫博物院院务，不能不引起故宫同志的警惕。庄蕴宽因不久前血压高中风不良于行，他向报界公开发表启事，一则对自己主事期间“社会监视之严，同人扶助之切，此蕴宽所应为故宫博物院永永致其感谢者也”，二则政府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使得自己“仔肩既卸，借得养病，其为忻忭，尤难言喻”。^{〔3〕105-106}

23日下午2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大高殿开全体职员大会，庄蕴宽因病未到，由陈垣主席，商量对策，议决：政府一定要接收，我们亦不反对，须附有条件数项：（一）要求政府下命令，声明负保障故宫一切官产之全责，不能任意抵押，不能归还溥仪。（二）慎重移交，组织移交委员会。（三）清宫前所发现溥仪一切复辟文件，接收者不能私自毁灭，故宫博物院仍当保存。此外该会职员同时并组织一监督故宫博物院同志会，当时推定李宗侗、汤铁樵、马衡为该会组织大纲之起草员。^④

27日，国务院函庄蕴宽：“故宫博物院新委员均当代名流，赵、孙两委员长物望咸孚，对故宫事务按原定章程办理，有未妥者当急图修正。原有各职员，望曲为喻解，勿生误会。至接事日，祈迳与赵孙接洽。”^⑤

29日下午，马衡与吴瀛同到大院胡同见庄先生商谈交接问题。庄蕴宽与吴瀛拟订《组织移交委员会及其章程》，主体意思是要一一清点，方才可以明

责任，为将来监督张本。^{〔3〕106}

9月2日，赵尔巽、孙宝琦率随员到故宫博物院就职。第二天下午，两人“发请柬四张，邀陈垣、马衡、袁同礼、吴景洲四人在清史馆便饭，藉商交代事宜。届时只陈垣一人代表前往。席间赵孙说许多客气话，意在敦促赶快交代。陈垣谓该会四人对于清宫物品曾费多少气力，为国家保存故物计，应郑重将事，势须组织交代委员会，以明责任，否则无人敢负此责。赵孙见如是困难，且共请四人只来一人，极为不欢遂。无结果而散”。^⑥吴瀛说赵孙出面在清史馆设宴，招待善后会代表陈垣、江瀚、俞同奎、吴瀛云云^{〔3〕107}，恐有较大的误差。“先是赵孙曾以委员长名义请各委员及院部派员在神武门内开会，临时见陈垣态度如是，遂改发通知移在清史馆。闻大部份委员及院部派员出席，讨论结果，决定至必要时以武装接收。”^⑦

9月8日，故宫博物院组织点交委员会，“公推江瀚主席，议决故宫博物院因政府业经另组保管委员会预备接收，原有院中物品异常重要，旧日院中人员，如各部原派助理员，及所聘各界顾问，及本院职员等，均主张非组织点交委员会专办点交，不足以照慎而清手续。”^⑧惟赵尔巽孙宝琦两委员长，因陈垣传达的态度，颇为消极，9月6日乃以头绪繁多、责任非轻为理由，致函国务院辞职。9月7日国务会议议决复函慰留。^⑨

9月9日，京畿宪兵司令部以清宫交接问题，传询前委员会事务长陈垣。^⑩

国务院秘书长孙润宇多次催促庄蕴宽交接，庄蕴宽经与匿居东交民巷的李煜瀛、易培基往返商量后，定于18日下午开会办理，但双方到的人都不多，赵尔巽等始终未再出面，交接工作于是拖了下来。这样地相持着到了10月1日，杜锡珪内阁解体，以赵尔巽、孙宝琦为首的故宫保管委员会也随

①《院部筹备接收故宫博物院》，《申报》1926年8月15日。

②《十四日之阁议》、《故宫保管委员会办法》，《申报》1926年8月15日；《清室委员会改组 十四日阁议已通过办法及委员》，《申报》1926年8月18日。

③《赵尔巽（巽）当选保管故宫委员长》，《申报》1926年8月25日。

④《清委会对移交故宫之意见：提出附带条件三项，并组织监督故宫博物院同志会》，《申报》1926年8月27日。

⑤《故宫博物院问题》，《申报》1926年8月28日。

⑥《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⑦《京政府有将武装接收故宫说》，《申报》1926年9月9日。

⑧《故宫博物院组织点交委员会》，《申报》1926年9月12日。

⑨《赵孙辞保管故宫委员长 清委员会已准备点交矣》，《申报》1926年9月10日；《七日之国务会议》，《申报》1926年9月11日。

⑩《申报》1926年9月10日《陈垣因故宫事被传》：“昨故宫委员会事务长陈垣被宪兵司令部传询，经梁士诒方面斡旋，由孙宝琦、庄蕴宽保释。闻系清宫交代问题，陈云并无不交代情形，正在办交代手续。”《汉文京津泰晤士报》1926年9月21日：“宪兵司令王琦，则以委员会拒绝接收之故，遂令武装宪兵传拘陈垣问话，陈即据词答复，王无以难，乃送至回家，犹命便衣侦两人，监其出入。”

之消失。

五、再次抵制军队进驻故宫

庄蕴宽因为中风不能出门^①，故宫院务久无人主持。李煜瀛的意思，要邀集一时的名流学者，发起一个维持会，叫政府当局以及军警有关系的人们，一致以私人资格加入，大家来合力维护故宫。1926年10月13日，由汪大燮、颜惠庆、江瀚、王宠惠、庄蕴宽、熊希龄、范源濂等7人出面，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但没结果而散。

1926年10月，奉天军队入主京师，一时大高殿以及神武门外筒子河营房，都有大队人马要来占用。10月下旬的一天，入京的奉军张宗昌令部下夜闯故宫“借宿”。庄蕴宽迅令护宫人员严加把守，坚持抵制军队进驻，防止古物被抢。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不能不稍加提及。据《申报》报道《庄蕴宽因误会受惊：宪兵司令部坚请庄氏一谈，经于珍陈兴亚解围》，说的是“当十日之前，奉、鲁军议定大举南下援孙，苏人董康因电请兵者，被孙传芳、张宗昌下令通缉。维时旅京苏人庄蕴宽、赵椿年、张相文，曾以快邮代电分寄奉张、鲁张、孙传芳、杨宇霆等，请慎重出兵，并略为董康辩护。同时派人谒杨宇霆，请为挽救。此电去后，亦无何等消息。昨晚（三十日）八时许，忽有宪兵司令部副官、兵士共四名，分乘汽车两辆，驰至住宅，以司令王琦名片进。庄当延入。某副官见庄，礼甚恭，谓奉上命，请庄氏往司令部一谈。庄谓往谈未尝不可，但果有何事，且因病后体未复元，不能行。某副官谓所事亦未知，如不能行，则可抬往。庄谓正苦不能吹风，否则何害。某副官复称此来系奉命令，仍请一行。庄谓吾亦国家特任官，苟有事，能自任必不逃避，何妨先以事相告。某副官亦甚客气，谓既如此，暂当在此坐守。方庄与某副官言谈间，庄虽镇静，而其家人则异常恐慌，亟由仆人于恽宝惠宅接庄夫人回，并在宅外用电话告汪大燮，恳为设法。庄夫人回时，适某副官请搜查，庄夫人答谓此为公事，理可搜查，即请从事。如有查不到处，并

愿指导某副官搜。后亦未查出何物，而汪亦已为电顾维钧，由顾电卫戍司令于珍询问。于氏答以不知有此事，允即电庄宅询问在彼之副官。但电不能通，于氏乃亲乘汽车驰往庄宅。同时警察总监陈兴亚闻讯亦至。于、陈两氏当同入见庄，并询某副官原因。某副官约略陈述，于、陈两氏当笑谓出于误会，应勿置议。当令某副官向庄道歉，于、陈并安慰庄氏，方偕同而出。一场风波方告了结。时正晚间十一时也。”^②事情的起因、经过都十分清楚，但在故宫院史叙述中，就变成了庄蕴宽坚持不肯让奉军驻扎故宫，终于导致12月1日晚张宗昌指使宪兵司令王琦派宪兵包围庄蕴宽的住宅，准备逮捕庄蕴宽。后来经过新任国务总理顾维钧、京畿卫戍司令于珍、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等人调停，并急电请示正在天津的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另一说为杨宇霆），才得解围。其中的时间、事由等错误一目了然，写史可不慎哉！

12月9日，维持会发起人再次在欧美同学会集会，通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暂行简章》，推选江瀚为会长，庄蕴宽、王宠惠为副会长，继续主持故宫博物院院务。其时庄蕴宽风湿日亟，渐成偏瘫，不良于行，但仍切念院务，对故宫博物院事务的关心始终未减。

1927年，张作霖入主北京时，庄蕴宽因为身体原因，早在1927年2月26日就已称病告假，闲居京城，继续疗养足疾。11月19日开缺（免除其审计院长职务）。1927年10月，张作霖组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庄蕴宽还在养病之中，官职也告一段落，就在北京闲居，暂时告别了曾倾注其大量心血的故宫博物院。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6月中旬抵北平，奉军退回关外，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现在几乎所有关于民国故宫历史叙述和研究庄蕴宽的文字，都说庄蕴宽出任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兼图书馆馆长。但事实是，1928年10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27人，其中有庄蕴宽^③。1929年3月1日，国府第

① 1926年7月30日，“庄蕴宽患脑炎昏去，施急救术后稍苏”。（《申报》1926年7月31日）从此出院后，庄蕴宽基本就在家休养。

② 《庄蕴宽因误会受惊：宪兵司令部坚请庄氏一谈，经于珍陈兴亚解围》，《申报》1926年12月6日。

③ 《中央政治会议记》，《申报》1928年6月21日。该文报道6月20日，中央政治会议开第145次会议，决议：《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草案）》通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草案）》通过，交国民政府公布；任命李煜瀛、易培基、汪精卫、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江瀚、薛笃弼、庄蕴宽、吴敬恒、谭延闿、李烈钧、张人杰、蒋中正、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柯劭忞、何应钦、戴传贤、张继、马福祥、胡汉民、班禅额尔德尼·恩克巴图、赵戴文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但其导语误写为“任命故宫博物院理事二十八人”。因经亨颐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的提案，直到1928年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10月8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并发国民政府令，任命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二十二次国务会议决议,派易培基兼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张继兼文献馆长,庄蕴宽兼图书馆长,马衡为古物馆副馆长,沈兼士为文献馆副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馆副馆长^①。但由于庄蕴宽此时已在镇江,并没有到北平故宫来任职。3月17日,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到故宫任职,庄蕴宽没有到任^②。1932年4月30日,行政院开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庄蕴宽因病出缺,遗缺以现代理该馆馆长江瀚继任^③。应该说,从此时起,庄蕴宽与故宫博物院已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了。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钮永建出任江苏省主席一职。社会安定后,苏省也模仿其他省份开局修志,赵凤昌向钮永建提议由庄蕴宽主持修志局事务,遂以政府名义聘请庄氏为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总纂。庄蕴宽的足疾在休养经年之后渐见缓减,身体渐渐好转,1929年1月11日庄蕴宽应邀离平南归^④。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会于1929年1月16日召开成立大会^⑤,聘请知名学者孟森、柳亚子、张相文、柳诒徵、丁福保、陈汉章、冯蒙华等16人为采访编辑,以《江苏通志》为参考,由朱文鑫另设体例目类,开始省志的编纂。修志之所选在镇江焦山松寥阁碧山庵。

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庄蕴宽就与故宫

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一八”惨案后,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遭通缉,新推委员长卢永祥没有到职,庄蕴宽以副委员长出面担当重任,两拒故宫驻军,坚持点交文物,体现了一个故宫守护者始终不离不弃舍身庇护的担当精神,在故宫博物院最初的创建以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高拜石遗,古春风楼琐记(第十集)[M].台湾新生报社,1979年再版,1981年四版,第335页.
- [2] 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 [3] 吴瀛.故宫尘梦录[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 [4] 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自订年谱辑注》,《严修先生年谱》(版权页书名为《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462.
- [5]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48.
- [6] 李煜瀛至陈垣函影印件,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164.
- [7]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65—66.

(责任编辑:闫卫平)

Zhuang Yunkuan and the Palace Museu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ZHANG Hong-wei

(Institute of Museum Science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 of Qing's royal family was established, Zhuang Yunkuan has had the indissoluble bond with the Palace Museum. After the March 18th Incident, the director of Palace Museum, Li Yuying, was wanted and the new chairman Lu Yongxiang did not take office. Thus, Zhuang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vice-chairman, refused garrison in the Palace Museum twice and insisted on checking cultural relics, which reflected a spirit of never leaving or forsaking and giving asylum as a guardian of the Palace Museum. Zhuang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Key words: Zhuang Yunkuan; The Palace Museum; The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 of Qing's Royal Family; Maintaining Member of the Palace Museum

① 《昨日之国务会议》,《申报》1929年3月2日。

② 《申报》1929年3月19日。

③ 《行政院决议案》,《申报》1932年5月1日。

④ 《申报》1929年1月13日。

⑤ 《公牒:总务类:省政府秘书处函:第七一号(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为本日上午九时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会开成立会希派员参加由》,《江苏省政府土地整理委员会公报》1929年第2期,第47页。